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经济论坛

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59期）

为什么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2年12月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为什么未来五年对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

报告人：张杰

2022年12月28日

一、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蕴含的重要经济发展目标

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三十年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机遇期。而在这三十年期间，可将中国的具体经济发展任务分解为两个阶段：

——从2020年到2035年的这十五年期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二是从2035年到2050年的这十五年期间，中国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由此可以得到的基本判断是，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精神的指引下，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在未来三十年期间，非常有必要从两个十五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应该达到的合理水平加以全面理解如何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科学理解2020年到2035年这十五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具体实现方式

第一，什么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十大报告对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目标做了具体定义，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带来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人均GDP究竟如何定义和认识?

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y）的定义：又称已开发国家和先进国家。是指那些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准较高，人民生活水准较高的国家，所以又称作高经济开发国家(MEDC)。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是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准和生活品质。借由开发自然资源也可以达到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类发展指数。

然而，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的门槛定义并没有形成共识，迄今为止尚未有发达国家的明确定义，联合国也没有建立出一套完善的系统来认证哪些国家或地区是属于已开发或发展中。

——普遍得到认可的定义是：发达国家的定义标准是较高的人均GDP和社会发展水平，通常以2万美元作为分界线。人均GDP为2万美元才算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而2万美元到4万美元为中等发达国家，4万美元以上为高度发达国家。

——另一种也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发达国家的基本标准是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

从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2021年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国家只有43个。而按照OECD的定义，截止2021年底全球共有43个发达经济体。这两个不同划分标准所定义的发达国家覆盖范围基本雷同，

由此可见，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应该是定义发达国家较为科学、较为合理的重要标准。因此，我们就从2021年全球这43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科学分析和判断的基准条件。

重要结论是：

——可以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人均GDP水平可以设定为2.2万-3万美元左右（以2020年不变价计算）。

——有必要将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均GDP水平设定为2.2至2.5万美元的期间之内。

参考IMF、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数据，2021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门槛约在3万美元左右，这也符合国际上针对 2万美元到4万美元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定义。因此，我们的定义应该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第二，如何定义2020年到2035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速水平?

表 1　　对中国 2020 年至 2035 年期间人均 GDP 水平的预测

	2020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人均 GDP 同比增速的年均水平
情形 1	1.05 万美元	2.5 万美元	5.95%
情形 2	1.05 万美元	2.2 万美元	5.05%
情形 3	1.05 万美元	2.0 万美元	4.39%

表 2　对中国 2022 年至 2035 年期间人均 GDP 水平的预测

	2022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人均 GDP 同比增速的年均水平
情形 1	1.3 万美元	2.5 万美元	5.16%
情形 2	1.3 万美元	2.2 万美元	4.13%
情形 3	1.3 万美元	2.0 万美元	3.37%

重要结论是：

我们认为，即在不考虑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发生变化和中国人口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鉴于中国在未来十五年期间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会以较大概率维持在5.5%至4.6%区间，而且经济潜在增速必然会出现由前期的5.5%向中后期的4.6%逐步下滑下降的前提下，在2035年，中国人均GDP水平目标应该设定为2.2万美元与2.5万美元之间。

（一）科学理解2035年到2050年这十五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具体实现方式

第一，如何理解和测算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发展目标?

这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定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特别是如何从经济发展目标和人均GDP水平来科学定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条件?

在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中国当前所有问题最为基础、最为根本因素精神的指引下，衡量中国是否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为核心指标之一，必须最终落实到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乃至人均GDP水平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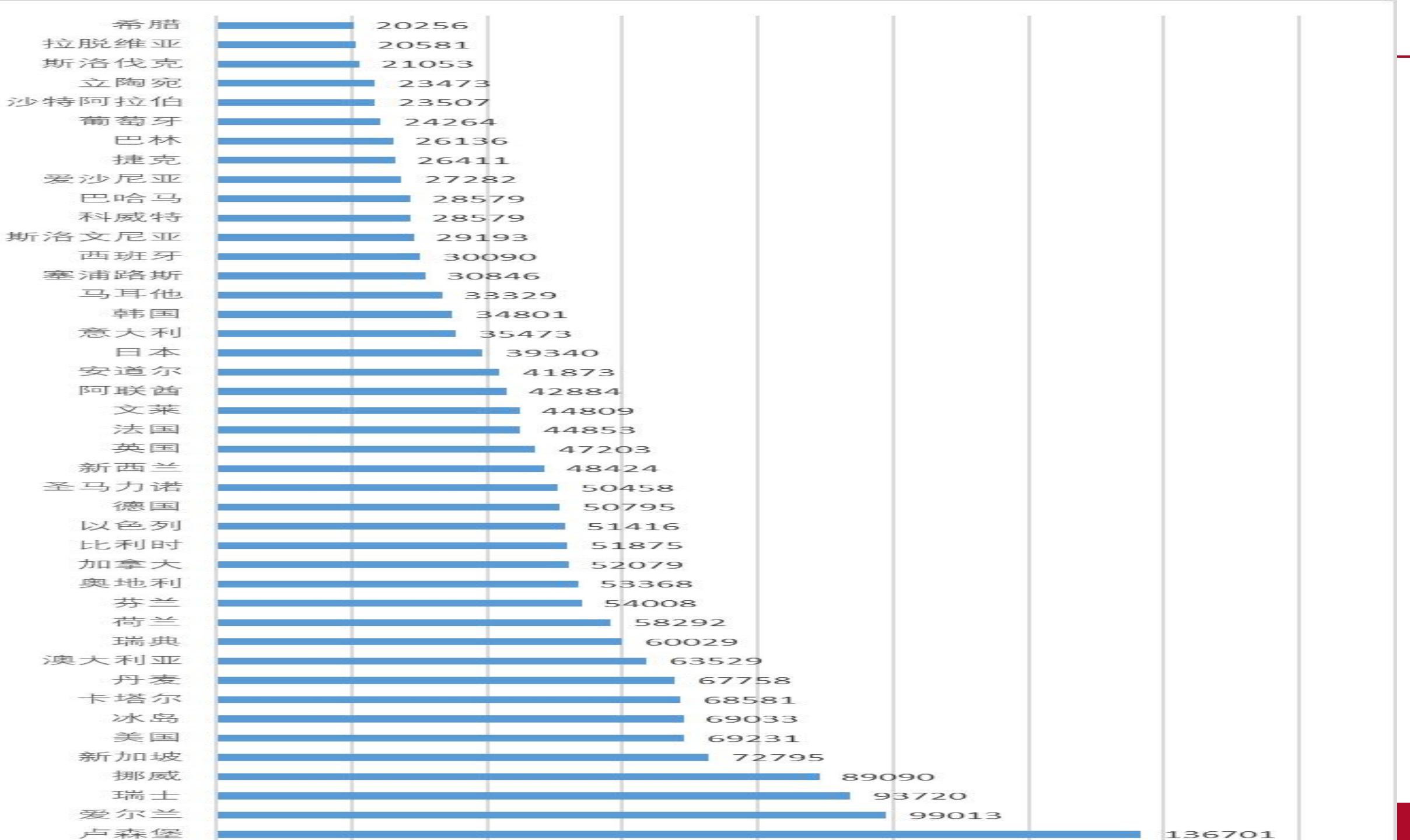
问题是二十大报告中并没有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人均GDP水平的规定。

我们对之的研究和思考的是：

：

——从全球2021年43个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的平均值来看为48488.美元，中位数水平为44853美元。因此，倘若将205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定义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可将205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设定为4-4.5万美元期间。**

——而在全球发达国家之中，人口超越5000万美元并且在人均GDP超越3万美元的国家只有7个，这称为全球有影响力的主要国家的“5030俱乐部”。中国在2050年左右的人均GDP水平必定要进入所谓的“5030俱乐部”。**这就意味着，在205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水平必然至少要达到4万美元以上。**


希腊 20256
拉脱维亚 20581
斯洛伐克 21053
立陶宛 23473
沙特阿拉伯 23507
葡萄牙 24264
巴林 26136
捷克 26411
爱沙尼亚 27282
巴哈马 28579
科威特 28579
斯洛文尼亚 29193
西班牙 30090
塞浦路斯 30846
马耳他 33329
韩国 34801
意大利 35473
日本 39340
安道尔 41873
阿联酋 42884
文莱 44809
法国 44853
英国 47203
新西兰 48424
圣马力诺 50458
德国 50795
以色列 51416
比利时 51875
加拿大 52079
奥地利 53368
芬兰 54008
荷兰 58292
瑞典 60029
澳大利亚 63529
丹麦 67758
卡塔尔 68581
冰岛 69033
美国 69231
新加坡 72795
挪威 89090
瑞士 93720
爱尔兰 99013
卢森堡 136701

第二，如何定义2035年到2050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速水平?

表 3 对中国 2035 年至 2050 年期间人均 GDP 水平的预测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2050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人均 GDP 同比增速的年均水平
情形 1	2.5 万美元	4 万美元	3.18%
情形 2	2.2 万美元	4 万美元	4.07%
情形 3	2.0 万美元	4 万美元	4.73%

表 4　对中国 2035 年至 2050 年期间人均 GDP 水平的预测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2050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人均 GDP 同比增速的年均水平
情形 1	2.5 万美元	4.2 万美元	3.52%
情形 2	2.2 万美元	4.2 万美元	4.41%
情形 3	2.0 万美元	4.2 万美元	5.07%

表 5　对中国 2035 年至 2050 年期间人均 GDP 水平的预测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2050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人均 GDP 同比增速的年均水平
情形 1	2.5 万美元	4.5 万美元	4.00%
情形 2	2.2 万美元	4.5 万美元	4.89%
情形 3	2.0 万美元	4.5 万美元	5.56%

表 6　对中国 2035 年至 2050 年期间人均 GDP 水平的预测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2050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人均 GDP 同比增速的年均水平
情形 1	2.5 万美元	4.8 万美元	4.44%
情形 2	2.2 万美元	4.8 万美元	5.34%
情形 3	2.0 万美元	4.8 万美元	6.01%

重要结论是：

我们认为，在不考虑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发生变化和中国人口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鉴于中国在2035年至2050年这未来十五年期间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会以较大概率维持在4.2%至3.6%区间，而且经济潜在增速必然会出现由前期的4.2%向中后期的3.6%逐步下滑下降的前提下，**在2050年，中国人均GDP水平目标应该设定为4.0万美元（以202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与4.2万美元之间。**

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倘若在2035年中国人均GDP水平达到2.5万美元的前提下，后续在2050年中国人均GDP水平达到4万美元的假定情形下，2035年至2050年十五年期间的人均GDP增速水平只要达到3.18%，达到4.2万美元十五年期间的人均GDP增速水平只要达到3.52%，达到4.5万美元十五年期间的人均GDP增速水平只要达到4.00%。因此，我们认为，针对中国式现代化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而言，必须努力在2035年达到人均GDP水平2.5万美元的目标，从而可以极大地减轻2035年至205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求和压力。

——倘若考虑今后三十年期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难以避免的升值空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会在更短时期内实现2035年2.2万至2.5万美元以及2050年4万至4.2万美元的发展目标。但是，这种由于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实际汇率变化带来的中国人均GDP水平的变化现象，未必可以真实反映中国的真实经济发展进程。

——倘若考虑今后三十年期间中国人口规模会由2021年14.6亿人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12亿乃至更低的人口规模，这就对中国人均GDP水平的发展趋势造成不同的影响效应：一是中国的人口规模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结构性变化带来的未来经济潜在增速的加速下滑现象，对中国未来的人均GDP水平增长造成更大的抑制效应；二是中国的人口规模下降会促使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这两种效应的影响作用，显然需要更为细致的通盘研究。

二、如何理解未来五年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至关重要性

第一，未来五年是中国在未来三十年期间能否将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维持在较高合理水平、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速水平目标的关键时期。

要将中国的人均真实GDP增速水平在2023年至2035年期间维持在5%左右，而要将中国的人均真实GDP增速水平2035年至2050年期间维持在3.5%水平左右，未来的五年至关重要。

——2020年至2022年持续三年的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对中国经济造成了难以忽略的负面冲击，迫使中国经济偏离了既有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而且，持续三年的全球新冠疫情以及中国坚持的“动态清零”管控政策对部分中小微企业经营活动、部分群体的收入能力和消费能力、消费预期，均造成了难以忽略的负面冲击效应，使得当前中国经济发生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当前中国经济恢复和消费修复的基础非常不牢固。

在2023年以及未来尽快短的时期内，通过五大政策举措和五大领域的工作重点，尽快使得中国经济尽快恢复到既有的中高速增长水平轨道，回归既有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倘若考虑今后三十年期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难以避免的升值空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会在更短时期内实现2035年2.2万至2.5万美元以及2050年4万至4.2万美元的发展目标。但是，这种由于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实际汇率变化带来的中国人均GDP水平的变化现象，未必可以真实反映中国的真实经济发展进程。

——从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必然处于一个逐步持续下降通道之中，从而最终影响和决定中国未发展规律和演化逻辑来看，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经济潜在增速水平来的经济增速水平的“天花版”。

倘若中国未来五年不能通过全面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有效落实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发展战略，来将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在较高的合理水平，必然会导致中国错失未来的经济发展机会。

第二，未来五年是中国主动应对和破解化解美国全面技术封锁和高端产业遏制策略、创造至少难以排斥中国发展利益的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时期。

当前，中国的产业发展正在面临“低端转移、高端挤压”的独特双重风险，特别是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升级面临典型的“低端转移、高端挤压”或“上有打压，下有追兵”的双重困局。

——面对中国正在构建的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升级为目标的现代产业体系，美国的应对策略就是展开和实施针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体系的全面技术封锁和遏制策略，主动实施制造业回流战略，同时，积极拉拢美国的经济政治盟友组建针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体系组建各种形式的封锁和遏制利益共同体，从而全面压制和阻碍中国利用独特的“弯道超车”机会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正在图谋利用低端制造业向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转移，重新组建排斥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进而削弱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规模优势，抑制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升级能力。

值得重视的现象是：

在面临“低端转移、高端挤压”的独特双重风险的情形下，留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并不长，可能只有五年到八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由此所面临的风险不可忽略。

第三，未来五年是中国能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扭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早过快”下滑重大问题的关键时期。

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决定中国式现代化：能否由“制造大国”转化为“制造强国”，尤其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中国本土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既是中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任务，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基础性因素，更是中国能否将经济增速水平在未来三十年期间维持在一个合理中高速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十四五规划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重大判断，预示着构建完全体现既适度自主可控，又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充分融合的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特别是在未来五年内，彻底扭转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滑以及中国的部分地区出现制造业“空心化”和“加速外移”的重大现象，成为维持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中高速增速水平的核心条件。

我们的重要判断是：

因此，针对中国整体层面特别是部分地区中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早过快”下滑的苗头，同时兼顾中国各地区发展条件和禀赋优势的巨大差异性，尽快制定 2023—2040 年期间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维持在25%左右的发展目标和具体举措。与此同时，要有底线思维，前瞻性地将该比重长期稳定在 20% 左右水平的战略目标。

第四，未来五年是中国能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维护中国国家最为基础的发展安全权的关键时期。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面临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自主突破的自然周期被大大压缩的风险。特别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实施全面封锁和遏制的情形下，中国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培育塑造的自然周期被大大压缩，可能只有5-7年。

中国在这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少则需要3-5年，多则需要10年以上，平均需要周期在5-7年。

——从2020年开始到2022年年底的新冠疫情冲击已经持续将近3年，在一定程度上对留给中国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自主突破的机遇窗口期造成了耽搁和延误效应，对中国依靠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型动力机制的发展战略，造成额外的发展风险。

——依据202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强调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要在2023年尽快短的时间内加快推动经济恢复到既有的中高速增速水平的基础性作用。

产业政策要瞄准发展和安全并举。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要有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布局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能力，加快引进高端人才。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聚焦“为什么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

12月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9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为什么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王一鸣、刘元春、毛振华、苏剑、董煜、张杰**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张杰**代表论坛发布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蕴含的重要经济发展目标

二、如何理解未来五年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至关重要性

一、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蕴含的重要经济发展目标

从这个角度切入，是因为二十大报告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中国当前所有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的、决定性的因素。**

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三十年是中国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机遇期，而在这三十年期间，可将中国具体的经济发展任务分解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人均 GDP 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二个阶段是从2035年到2050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里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定义和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从二十大报告里强调的这两个重要阶段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精神指引下，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三十年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准点或者立足点，**就是如何准确有效地理解这两个阶段中，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的基本任务，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任务。**

1、科学理解2020年到2035年这十五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具体实现方式

1）什么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十大报告指出，从2020-2035年，我国要实现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联合国、OECD 等国际组织的定义来看，发达国家又称已开发国家和先进国家，是指那些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人民生活水准较高的国家，所以又称高经济开发国家（MEDC）。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是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准和生活品质。

虽然一些国际组织对发达国家有初步的定义，但到对于发达国家人均 GDP 水平并没有形成共识，联合国也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体系加以认证和定义哪些是属于发达国家。这就给我们定义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带来了第一个挑战。

很多国际组织普遍认可的一种定义是以2万美元的人均 GDP 作为分界线，过了2万美元门槛属于发达国家，2-4万美元称为中等发达国家，4万美元以上称为高度发达国家。也有一些组织和研究成果认为发达国家的应以人均 GDP3万美元为标准。这两种说法中，第一种更为普遍。

依据第一个标准来梳理全球的基本情况：2021年人均 GDP 超过2万美元的国家全球只有43个。按照 OECD 的定义，截止2021年底全球共有43个发达经济体。这两个定义标准覆盖的国家基本相同。**因此，可以判断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是定义发达国家较为科学和合理的标准。**

由此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一是可以将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水平设定为2.2万-3万美元左右（以2020年不变价计算）；

二是不考虑通货膨胀，2035年中国实现基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均 GDP（以2020年不变价），也应该定为2.2万-2.5万美元之间。参考 IMF、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数据，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门槛约在2万-3万美元之间。因此，这个定义也具有一定合理性。

2）如何定义2020至2035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的人均 GDP 的增速水平

第二，如何定义2020年到2035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速水平?

表 1　对中国 2020 年至 2035 年期间人均 GDP 水平的预测

	2020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人均 GDP 同比增速的年均水平
情形 1	1.05 万美元	2.5 万美元	5.95%
情形 2	1.05 万美元	2.2 万美元	5.05%
情形 3	1.05 万美元	2.0 万美元	4.39%

按美元计算，2020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是1.05万美元。分三种情形来讨论：1）假设2035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为2.5万美元，这十五年期间人均 GDP 增速应该是5.95个百分点；2）若以2.2万美元为目标，这十五年期间人均 GDP 增速应该是5.05个百分点；3）若以2万美元为目标，这十五年期间人均 GDP 增速应该是4.39个百分点。

表 2　对中国 2022 年至 2035 年期间人均 GDP 水平的预测

	2022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人均 GDP 同比增速的年均水平
情形 1	1.3 万美元	2.5 万美元	5.16%
情形 2	1.3 万美元	2.2 万美元	4.13%
情形 3	1.3 万美元	2.0 万美元	3.37%

以1.3万美元作为2022年人均GDP的基准，同样分三种情形：1）假设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未来十三年人均GDP增速水平应为5.16%；2）若以2.2万美元为目标，这十三年期间人均GDP增速水平应该是4.13%；3）若以2万为目标，这十三年人均GDP增速应该是3.37%。这是理论预测的平均增速，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波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不考虑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动，以及中国人口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中国未来十五年期间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会以较大概率维持在5.5-4.6%的区间。在潜在经济增速会逐步下降的情况下，2035年中国人均GDP目标以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应该设定在2.2万美元与2.5万美元之间。因此，未来十三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速至少应该维持在4.13%-5.16%，这样才能在2035年左右实现人均真实GDP水平达到2万美元以上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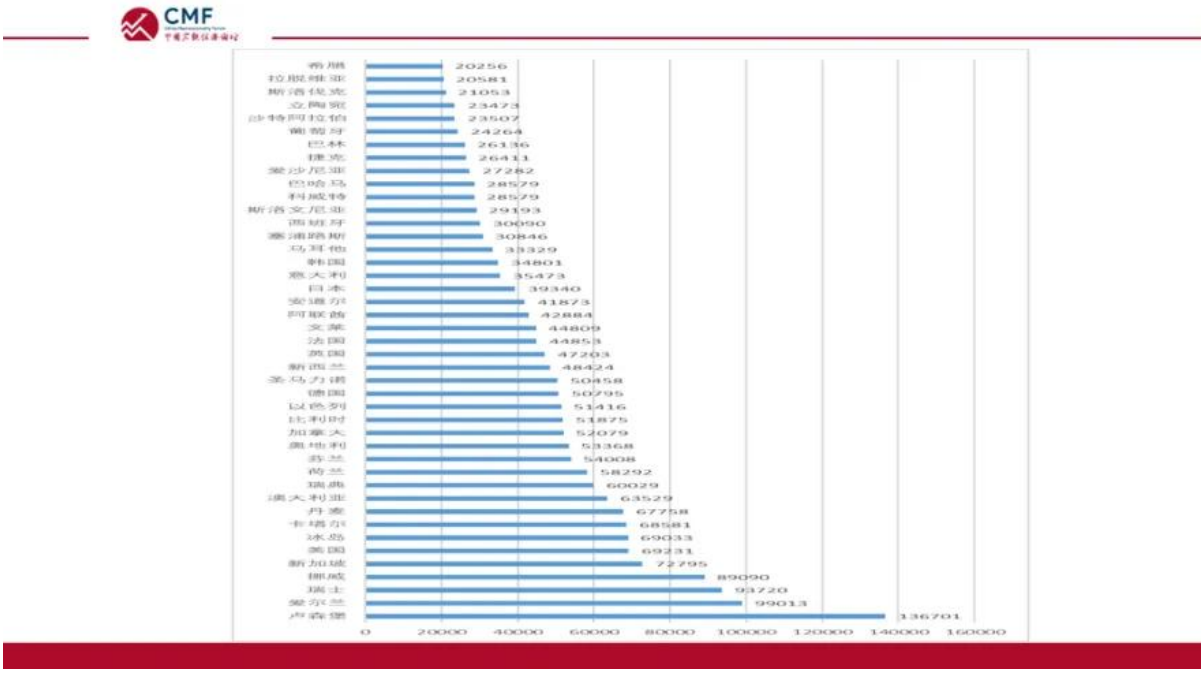
2、科学理解2035年到2050年这十五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具体实现方式

1）如何理解和测算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发展目标

二十大报告中，对初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做出了定义，但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做出明确规定，需要加以科学的预测和判断。可以确定的是，**在2035-2050年期间，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仍然是解决当前所有问题最为根本的因素。**因此，衡量中国是否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必须要落到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人均GDP水平上。

一方面，在2021年，全球43个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均值为48,488美元，中位数水平为44,853美元。若将2050年中国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定义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就意味着要将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设定在4-4.5万美元之间。

另一方面，在全球发达国家之中，人口超越5000万美元并且人均GDP超越3万美元的国家只有7个，称为“5030俱乐部”。2050年以后，中国肯定会进入“5030俱乐部”并成为其中主要的国家，这意味着在205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水平至少要达到4万美元之上。



综合这两个角度，我们将2021年全球43个人均 GDP 超过2万美元的发达国家进行排序。人均 GDP 最低的国家是希腊，正好达到2万美元左右；突尼斯、立陶宛是2.3万左右；最高的是瑞士、爱尔兰等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按世界整体人均 GDP 的水平核算，达到发达国家的门槛意味着立陶宛这些国家处在统一水平。但由于我国人口比它们多得多，到2050年，我国人均 GDP 可能与文莱、法国、英国等国处于相近的水平。

2）如何定义2035年到2050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的人均 GDP 增速水平

第二，如何定义2035年到2050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速水平?

表 3 对中国 2035 年至 2050 年期间人均 GDP 水平的预测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2050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人均 GDP 同比增速的年均水平
情形 1	2.5 万美元	4 万美元	3.18%
情形 2	2.2 万美元	4 万美元	4.07%
情形 3	2.0 万美元	4 万美元	4.73%

假设2050年人均 GDP 水平达到4万美元（以2020年不变值计算）：1）若2035年人均 GDP 为2.5万美元，十五年的年均增速是3.18%；2）若2035年人均 GDP 为2.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4.07%；3）若2035年人均 GDP 为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4.73%。

表 4　对中国 2035 年至 2050 年期间人均 GDP 水平的预测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2050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人均 GDP 同比增速的年均水平
情形 1	2.5 万美元	4.2 万美元	3.52%
情形 2	2.2 万美元	4.2 万美元	4.41%
情形 3	2.0 万美元	4.2 万美元	5.07%

假定2050年人均 GDP 水平达到4.2万美元（以2020年不变值计算）：1）若2035年人均 GDP 为2.5万美元，十五年的年均增速是3.52%；2）若2035年人均 GDP 为2.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4.41%；3）若2035年人均 GDP 为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5.07%。

表 5　对中国 2035 年至 2050 年期间人均 GDP 水平的预测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2050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人均 GDP 同比增速的年均水平
情形 1	2.5 万美元	4.5 万美元	4.00%
情形 2	2.2 万美元	4.5 万美元	4.89%
情形 3	2.0 万美元	4.5 万美元	5.56%

假定2050年人均 GDP 水平达到4.5万美元（以2020年不变值计算）：1）若2035年人均 GDP 为2.5万美元，十五年的年均增速是4.00%；2）若2035年人均 GDP 为2.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4.89%；3）若2035年人均 GDP 为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5.56%。

表 6　对中国 2035 年至 2050 年期间人均 GDP 水平的预测

	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2050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预测值）	人均 GDP 同比增速的年均水平
情形 1	2.5 万美元	4.8 万美元	4.44%
情形 2	2.2 万美元	4.8 万美元	5.34%
情形 3	2.0 万美元	4.8 万美元	6.01%

更乐观一点，假设2050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达到4.8万美元（以2020年不变值计算）：1）若2035年人均 GDP 为2.5万美元，十五年的年均增速是4.44%；2）若2035年人均 GDP 为2.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5.34%；3）若2035年人均 GDP 为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6.01%。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不考虑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以及中国人口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假设2035至2050年经济潜在增速在4.3%-3.6%之间，**2050年中国的人均 GDP 目标应该设定在4万美元-4.2万美元之间。**这个目标的压力是比较小的，无论2035年的人均 GDP 是2.5还是2.2万美元，达到4万美元，十五年增速只要3.18%或4.07%。若设定为4.2万美元，也只需要3.52%或4.41%的年均增速。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角度看，这个区间对中国来说是相对能够实现的。

在这情况下，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假定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若2050年中国人均GDP水平达到4万美元，十五年期间人均GDP增速应该为3.18%；若2050年人均GDP达到4.2美元，十五年期间的人均GDP增速应该为3.52%；若2050年人均GDP达到4.5万美元，十五年期间的人均GDP增速应该为4.00%。**因此，在2020-2035年期间，特别是到2035年末，中国人均GDP应该争取达到2.5万美元，这样就可以极大地缓解2035-2050年期间经济发展的压力。**若未来这五年没有把GDP推上一个较高的水平，后续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重大挑战，反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得越好，2035年-2050年目标的实现就越容易。

假定人民币相对美元在未来三十年期间大概率处于升值空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更容易更快。但我认为不能简单以汇率来计算。比如日本今年人均GDP低于4万美元，这是由于日本汇率贬值导致的，而不是日本真实GDP收缩造成的。当然也可以认为，汇率贬值是由于日本经济和产业竞争力下降。但仅仅依靠汇率的变化来判断，可能无法反映一国真正的经济发展的进程。

同时，人口问题将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影响。据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可能会降到12亿甚至更低，这将对2050年中国人均GDP水平产生影响。一方面，人口规模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加速中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速的下滑，对未来人均GDP水平产生比较突出的抑制效应。另一方面，人口规模下降，人均GDP提高的空间就相对越大，这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影响。综合起来，到底是负面效应更大，还是正面效应更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如何理解未来五年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至关重要性

1、未来五年是中国在未来三十年期间能否将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维持在较高合理水平、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速水平目标的关键时期

要将中国2023-2035年人均GDP增速维持在5%左右，2035-2050年维持在3.5%左右，未来五年至关重要。未来五年是我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高水平自立自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维持稳定我国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的关键时期。如果不能通过真正的改革，充分挖掘经济潜在增速，经济的中高增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问题。若未来改革能够顺利推进，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空间和红利将得到充分的释放，维持较高的合理水平，后续目标才会有坚实的基础。错失这五年，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后面的路将越走越难。

持续三年的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影响，使中国经济极大地偏离了既有的潜在增速水平。并且这次冲击不是短期的，可能会造成结构性影响，从而影响到未来经济潜在增速水平。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改革，尽快消化和恢复这三年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抛弃了以往简单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重新定义了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政策，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的五大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社会政策。通过构建和推进新的宏观政策调控体系，使中国经济尽快回到既有的增长水平，同时维持这一增速水平的合理区间。

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水平处在逐步下滑的状态，这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逻辑。对此，我提出结构性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充分调动各种要素，激发配置资源的能力，这样就可以在较长的时期内将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这表明经济潜在增速水平不一定一直处于下滑的通道，也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处于一个相对平缓的状态，甚至有增长的可能性。

2、未来五年是中国主动应对和破解美国全面技术封锁和高端产业遏制策略，创造至少难以排斥中国发展利益的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时期

中国的产业发展面临着“低端转移、高端挤压”的巨大风险。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一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高端产业，逐步向印度、越南、东南亚等其他国家转移的趋势不可阻挡。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转移的机会和转移的国家，构建一个良好的有利于我国的区域性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此外，产业逐步向中高端升级换代，面临着“高端挤压”的问题。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率先采取措施对我们进行打压。

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有相当的成效和效果。比如，iPhone14和 iPhone13相比，从美国采购的零配件的比重从26.4%增长到36%多，而从中国采购的比例从4.5%降到3.8%，这说明美国制造业回流取得了显著进展。此外，美国对制造业进行重新定义，不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分配的格局。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到底它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对我们将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应该如何应对。

在面临“低端转移、高端挤压”的独特双重风险的情形下，留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并不长，可能只有五年到八年。如果没有在这段时间内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制造业和高端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都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因此，未来五年极为重要。

3、未来五年是中国能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扭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早过快”下滑重大问题的关键时期

维持人均 GDP 增长的动力，就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因此，**能否由“制造大国”转化为“制造强国”，构建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中国本土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基础性因素，更是中国能否将经济增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在合理的中高速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十四五”规划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重大判断，意味着构建既自主可控，又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充分融合的现代化制造业体系，这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能否彻底的扭转改变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下滑，中国部分地区出现制造业“空心化”和“加速外移”的重大现象。

面对这种巨大的风险，我们要尽快制定2023年-2040年期间，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维持在25%左右的发展目标和具体举措。从更长期的角度看，能否把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维持在20%以上，是未来五年内我们能否在制造业强国方面有重大突破的一个基础条件。

4、未来五年是中国能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维持中国最为基础的发展安全权的关键时期

中国面临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自主突破的自然周期被大大压缩的风险。特别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实施全面封锁和遏制的情形下，**中国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培育塑造的自然周期被大大压缩，窗口期可能只有5-7年。**特别是很多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没有一二十年以上的沉淀和积累根本不可能实现。能够实现这些领域突破的企业，都投入了巨额的研发费用，花费十年甚至更长的周期才能突破。中国在这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在有以往积累的前提

下，平均还需要5-7年的时间。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意味着未来五年内，如果不能在这些领域做到自主突破，后续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更突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三年新冠疫情对很多“卡脖子”的领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耽搁和延误。所以，后续这几年的时间非常宝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要瞄准发展和安全并举，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战略产业的培育壮大，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要有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布局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是未来五年内必须强力推进的两大政策。**中国宏观政策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重新定义宏观政策，用新型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解决这些问题，做好政策托底，保障就业安全。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未来五年经济工作的目标、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认为，从经济的视角看，经济发展最核心的指标是人均 GDP 迈上新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在3.5-4万美元，我们依靠经济增速是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的，还需要考虑汇率水平。**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改善经济基本面，带动汇率提升，这是实现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重要条件。**此外，增速过低也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未来五年影响中国经济增速的几个关键性因素：1）经济增长如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其中关键是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达峰；3）中美博弈和科技脱钩。

最后，科技创新将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目前我国原创能力不强，部分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并且科技领军人才偏少。对此，要加快人才的培养，带动基础研究、原创能力不断突破，释放科技人员的创新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讨论发展目标和高质量发展时，不能把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质量。**推动全球化退潮的因素中，一

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分配不均问题。中国长时期的稳增长政策、扩张政策所形成的金融、资源瓶颈等各种风险的累计和现在的释放，存在一个周期性调整。如果房地产对经济的推动力不足，其他地方需要保持很高的增长来弥补。

此外，要充分考虑我国增长动力的转换。中国的增长动力中，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幅员辽阔，有自己的阶梯开发。在遭遇国际因素的挑战之后，要利用我国幅员辽阔和“一国两制”的优势，对不同的体制做出适当的经济安排。企业和企业家也是过去我国增长的重要动力，新旧企业家的交替转换是中国经济的基础条件。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未来五年是几大关键问题的节点期，如果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突破，民族复兴以及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到严重阻碍。首先，未来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增长动能和增长速度能否在全球滞胀的新阶段走出亮丽的增长路径，是对整个民族最大的考验。其次，未来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扭转不平衡、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据预测，2028年左右中国 GDP 总量可能会超越美国，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将是中美博弈，特别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窗口期。此外，未来五年是我国突破李约瑟之迷，全面实现“卡脖子”问题突破的关键期，也是全面实现以实体经济发展，以高端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关键期。

发展的关键是进行持续地改革，尤其是要突破渐进式改革的瓶颈期。要通过真改革，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新的激励相容体系。要集众智，处理好国内与国际、国有与民营、地方与政府、实体与虚拟之间的战略关系。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指出，美国乃至世界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对此，各国采取的都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但通过这种方法扩大出来的都是劣质需求，且这种需求不可持续，会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一个产能过剩的经济要持续增长，需要依靠产品创新。

在高利率情况下实现的高增长才是真正高质量的增长。经济中有大量的优质投资机会，才能将利率提高。十多年以来的零利率政策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非常好的科技进步成果，这些成果将继续推动美国经济向前发展。美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俄乌冲突逐渐结束，美国可能会继续加息，但步伐会减缓。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认为，**当讨论中长期问题时，反而需要更多地结合一些短期工作。**今年的年度工作部署和未来五年的工作有非常鲜明的对应关系，能否开好局决定了能否更好地实现当前和长远的结合。信心是明年，也是未来五年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政策建议：1）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2）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3）在产业和科技政策上，要着重创新，打造新的比较优势；4）深化改革开放，做到真改革。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要继续完善落实机制，把实践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此外，还要把政策的宣传解读放到制定的政策文本中，防止对政策的解读出现偏差。总体来说，要让明年真正成为复苏的一年，重塑信心的一年，这样才能为未来五年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应对周期调整、转换增长动力，力争较高经济增速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9期）上的发言

一、辩证看待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

在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不应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对立起来。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很多问题就没法解决。**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速再下台阶，做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中高速增长逐步至中速增长的心理准备。2009年时我曾做过一份报告，提到我国经济增速水平将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即由原来的10%以上的增速水平回落至个位增速水平，并预计年均增速在7%左右。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当时预计的增速仍然是偏高的。尤其是近三年来的疫情冲击，导致经济增长平台再度出现下移。2020年全年 GDP 仅增长2.3%，2021年经济虽然有所修复，但两年平均增速也仅有5.1%，而2022年在疫情反复、俄乌冲突等超预期因素冲击下，经济增速显著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即便2022年 GDP 同比增长4%，要实现2022-2023年两年平均增速高于5%，2023年 GDP 增速水平也要在6%以上，挑战仍然较大。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速从疫情前的5.5%或下行至4%左右，2023-2025年潜在增速回落至4.2%。在此情形下，未来我国经济增速长期或面临“保四争五”的格局。经济增速下台阶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对此需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二、全球化退潮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

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加剧，尤其是近年来，全球化退潮趋势愈加明显。全球化的退潮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化导致的资源、利益分配不均，这种利益分配不均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获得全球化红利的

发达国家内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可能会使得本国居民丧失一些工作机会，加剧国内矛盾。这些矛盾的出现会使得发达国家对外政策出现调整，逆全球化思潮在国内政治经济思潮中所占的比重提升，进而引发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调整。而跨国公司也不得不服从本国的政治博弈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调整公司战略，如撤销对外投资，将资本和工作岗位回流至本国，等等。

失去全球化红利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作为推动上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全球化退潮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失去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全球经济同时还面临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风险挑战，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受到扰动，欧洲经济面临衰退风险、美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面临进入经济增速下滑期的局面。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重要贡献者，在全球化退潮下，我国过去长久以来面临的外贸环境已经发生逆转，中国经济不可避免的也将受到影响。

三、中国经济仍处于周期调整阶段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周期并不仅仅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经济“繁荣—萧条—危机—复苏”的经济波动形态，更主要的是债务周期、金融周期、房地产周期的调整转换。从债务周期与金融周期来看，金融危机以来，出于稳增长的需要，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债务周期与金融周期的上行期，但近年来随着债务风险攀升至高位并已经有所显现，债务周期和金融周期的上行态势结束，进入了高位盘整甚至下行态势，这势必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冲击，甚至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超预期释放。从房地产周期来看，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地产曾经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但是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位运行，房地产这一主引擎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明显弱化，在此背景下，能否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在中国经济面临多重周期性因素调整的背景下，既要看到经济下行的压力，也要考虑周期性调整过程中产业领域、金融领域风险的释放。

四、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面临转换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面临多方面的调整转换压力。首先，从产业结构来看，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和腾挪的空间或受限。从三次产业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完成了农业国到工业国

的转变，金融危机后第三产业进一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但未来产业调整和腾挪的空间或将收窄。与此同时，在第二产业内部，传统的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面临的发展瓶颈增大，而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并不容易，未来能否成为拉动制造业增长的主导产业仍存在不确定性。**其次，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仍需进一步挖掘潜力。**中国幅员辽阔，各区域之间发展梯度较大，东部部分省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未来仍需进一步挖掘区域发展潜力，如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尤其需认真思考如何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独特优势，更快发掘其增长潜力。**此外，通过加大传统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面临挑战。**建国以来，经过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效，但客观而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未来基建投资规模增长空间。

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调整期，需重点关注企业家群体。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其中民营大公司由于更加科技化、市场化与全球化，是直接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但近年来，受监管政策调整、社会思潮变异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家精神有所动摇，企业家信心处于较低水平，企业家移民现象有所增多，未来仍需在提振企业家信心方面加大力度。与此同时，随着老一代企业家逐渐退出商业舞台，新一代企业家如何接棒、如何成长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纵观历史，放眼未来，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均发生了变化。但无论经济增长的轨道是否已然发生改变，我们都要保持定力，不能“自废武功”，也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好高骛远，而是应以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畏风险，勇于迎接挑战、战胜困难。

把握好未来五年，突破渐进式改革的瓶颈期，集众智进行真改革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9期）上的发言

党的二十大提出，未来五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局起步的关键期，这个论断具有坚实的实践逻辑基础和理论逻辑基础。在一个民族复兴和崛起以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每个环节都十分重要，但一些关键问题的节点期显得尤为重要。未来五年是几大关键问题的节点期，如果没有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突破，民族复兴以及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到严重阻碍。

一、未来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

去年我国人均 GDP 为12551美元，而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在1.3万美元，我们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只差500美元。只要稳定地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快零点几个百分点，就能够在2025到202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据我们团队预测，中国人均 GDP 将在2025年达到14700美元，在2027年达到15700美元。预计高收入国家人均 GDP 门槛值每年大约增加200美元，到2025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将恰好在1.4万美金左右。因此，在2025-2027年，我们基本上能够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虽然跨越大概率是必然的，但是从近三年来看，目前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是4.7%，与我们原来预计的5.5%有很大差距。2035年我国要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按不变价计算，2035年 GDP 增量和人均 GDP 就必须再翻一番，2020-203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就必须要达到4.83%，在“十四五”期间以及2022-2027年，平均增速就必须要达到5.5%左右。但是按照最新公布和今年预测的数字，疫情以来平均增长速度在4.7%，比预计的要低0.8个点。明年 GDP 增长速度能否超过5.5%，2024年、2025年能否实现常态化，达到5.5%-6%的增长水平，将考验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是否成功全面转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制度更为成熟、经济运行体系更为稳定、经济增长动能更为常态化，这样就不会出现过大的波动和起伏。相反，如果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政治发展之间就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就会出现拉美现象，在动能波动中出现兴衰的交替。未来五年，我国的增长动能和增长速度能否在全球陷入滞胀的新阶段走出亮丽的增长路径，对整个中华民族是最大的考验。

二、未来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扭转不平衡、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

2015年中国的 GDP 达到美国 GDP 的60%，中美大国冲突全面拉开帷幕。2019年我国 GDP 达到美国 GDP 的66.8%，2020年达到70%，2021年创历史新高达到76.1%。**2015年-2019年，中国占美国 GDP 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4个百分点，过去三年平均每年提升4.6个百分点，是一个加速赶超的过程。**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占美国 GDP 的比重回落了近9个百分点，仅为68.3%，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增长速度从去年8.4%回落到今年的3.2%左右。美国今年的实际增长速度在2%点多，名义增长速度却是9.0%；而中国实际增长速度3.2%左右，名义增长速度在6%左右。因此，今年美国名义 GDP 增速超过中国三个百分点，再加上截至目前人民币贬值了8.8%左右，导致中国占美国 GDP 的比重回落。未来，中美之间的博弈不会是一马平川的，中美 GDP 的总量也不是简单的直线上升，而是会有曲折的。预计明年中国 GDP 增长速度会达到5.5%左右，而美国 GDP 增长速度在0.7%-0.8%的水平。按照这样一种预测，不考虑汇率因素，明年中国占美国 GDP 比重会回升到73%。

在大国博弈中，GDP 占比60%和85%是两条分界线，是守成大国全面阻击新兴大国的关键点。一旦新兴崛起大国的 GDP 超过守成大国的85%以上，就意味着从不对称的博弈转换成对称博弈，迫使守成大国必须要全面改变传统的单边霸凌模式，向共存状态转变。这个阶段也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擦枪走火的高发期，危险重重。因此，2022年-2027年这五年，中国 GDP 占美国比重从70%左右上升到85%左右的阶段，也是冲突高发的核心阶段。如果在这几年我们能够扛住美国的各种打压，就会在2027年、2028年左右全面迫使美国调整战略。今年10月刚刚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以及美国智库对于中美经济形势的评估中提到，按现行汇价测算，中国 GDP 总量可能在2028年前后超越美国。**因此，未来十年是中美博弈，特别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窗口期，更是中国突破美国战略遏制和围堵的关键期。**

三、未来五年是突破李约瑟之迷，全面实现“卡脖子”问题突破的关键期

国家在2002年就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2009年系统制定新型战略性产业规划，2012年全面出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2015年制定了中国智造2025年规划。因此，中国在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等方面的布局，并非是从中芯事件、华为事件后才开始的，而是从新世纪以来就开始了。这二十年间，中国已经完成了一个技术进步和技术赶超的周期。未来几年，将是我们的技术在科学、产业和市场上的可行性的检验期，也是我们在“卡脖子”问题上，在670多项关键技术领域用长板补短板的关键时期。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美国完成产业链、供应链的全面布局之后，国内大循环在一些极端状况下是否还能够高效运转。

未来几年也是全面以实体经济发展，以高端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关键期，也就是突破鲍莫尔成本病的关键时期。随着 GDP 不断扩大，财富不断积累，非贸易品和一些传统的服务业的成本就会上升。大量的劳动和一些资源向服务业等劳动效率更低下的部门集聚，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下降，也导致非贸易品的快速提升和贸易品产业的空心化、泡沫化现象。这个时期，往往是鲍莫尔成本病交替出现的关键期，如何通过制定战略来进行突破就显得至关重要。

四、突破渐进式改革的瓶颈期，集众智进行真改革

发展的关键是进行持续地改革，尤其是要突破渐进式改革的瓶颈期。渐进式改革最大的问题是，在渐进过程中容易形成跨体制、跨模式间的套利行为。这种套利行为往往会导致新的利益集团的形成，从而阻碍改革。这些利益集团会进行假改革，并且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资源使一些改革计划空转，使改革无法落地。

过去出台了很多改革方案，国家战略制定得也很好，但是一些关键性的改革总是无法落地，比如围绕房地产、土地、财税体系和新兴激励体系的改革。目前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政府出现了塔西佗陷阱，出现了公信力的问题。如果想让市场主体相信我们要真改革，**就一定要在一些牛鼻子问题上动手，出台一些能够打破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的措施。**大国崛起首先是要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新的激励相容体系，而这个体系恰恰是真改革才能构建的。

此外，要集众智来形成真正的战略，处理好国内与国际、国有与民营、地方与政府、实体与虚拟之间的几大战略关系。这恰恰需要我们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改革。能否使潜在增长

速度提升两到三个百分点，使 TFP 贡献程度达到美国60%-80%的水平，这取决于我们在这些关键领域的改革。

未来，我们不仅仅面临着外部的各种挑战，更大的挑战是来自于内部利益结构重构，来自于智慧的重新凝炼，来自于我们对于一些系统性风险的化解。因此，未来五年是我们要把握的关键五年。

优化产业政策，推动落实经济工作会精神

董煜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董煜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9期）上的发言

一、结合短期工作，统筹当前和长远

党的二十大明确的2035年愿景目标，与两年前制定“十四五”规划时有约十处的重大变化。这种目标导向的变化会影响政策制定，影响各方面的工作。过去在讨论短期工作时，经常要引入中长期的视角。而现在当我们在讨论五年后这种中长期问题时，反而需要更多地结合一些短期的工作思路。比如明年作为关键的一年，它将在未来的五年中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六个更好统筹”，其中一个是“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讨论未来五年，不能不学习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中，很多内容虽然是短期工作，但其实都跟未来五年中央的全局性部署紧密相连。也就是说，今年的年度工作部署和五年的工作有非常鲜明的对应关系，**能否开好局决定了能否更好地实现当前和长远的结合。**

明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是改革开放的四十五周年。有很多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方面的工作，可能都要在明年启动。二是“十四五”规划的中期评估。未来五年的增长指标，要与这种中长期规划政策衔接，真正的中长期指标要等到“十五五”规划时做进一步的衔接和明确。明年要通过中期评估，把党的二十大的工作落实到“十四五”的后期，也落实到“十五五”的前期研究当中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一些重要的话，往往隐藏了极为关键的政策信息。比如个人认为2019年最重要的话是：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今天，在所有文件里都能看到的“系统观念”就来源于当时的“系统论”。2020年非常重要的话是：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内生动力，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这是当时八项任务布置的要点。2021年重点讲了五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在今天依然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决定了工作中很多思想认识的方法论。今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要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如何纲举目张，关键就是要提振信心。信心和当前的工作有关，也和未来五年甚至更长的时期紧密相关。**信心是明年，也是未来五年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二、产业政策制定角度的几点建议

1、优化发展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企业经济发展壮大。这说明中央看得很清楚，**民营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环境不太好。**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有一个很重要的窍门，就是去看辅导读本和“百问”，里面是官方对于一些重要叙述的解释。“百问”里总结了民营企业发展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包括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成本高的问题；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的问题；部分政策调整过快，影响企业经营，以及一刀切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甚至误伤部分民营企业的问题；民营企业自身缺乏转型升级能力的问题。对此，我认为明年需要用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今年的营商环境专项督查，建议明年继续做。不但要做，还要贯穿全年，作为重点督查，而且要专门找问题、找案例，严肃地进行处罚。

我们要争取推动在全党形成一个共识，即今后谁再歧视民营经济、谁再限制民营经济的发展，谁就是在违反党的大政方针，谁就是在损害党中央的权威，谁就是在破坏稳定发展的环境。确定这一坚决和鲜明的态度，是我们谈未来五年工作的一个根本前提。

2、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近期经济形势下，各方面都比较关注重启消费。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我国的主线。**它是“十三五”的主线，也是“十四五”经济工作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5年提出后经历了几个版本，1.0版是2015年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2.0版是2017年提出的“破立降”，3.0版是2018年提出的“八字方针”。“十四五”时期的4.0版本强调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今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处在4.0版的范畴内，即要把供需两方面的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

党的二十大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意味着要尊重产业规律，不再单纯地简单按领域区分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要在政策上将它融合起来对待。这样的政策要和扩内需的政策结合起来，既要找到着力点，也要找到结合点。扩大消费不能简单地依靠消费政策，更重要的是去稳企业、稳就业。近期，有很多建议提出大规模发放消费券，我认为这种建议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看待政策问题上固然可以有一些理想的、浪漫的想法，最终还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考虑这些政策是否能成为现实的选择，或者实施以后能否起到想象中的效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切实提高各方面的收入，单纯从对消费的促进作用看，这可能比简单地发放消费券效果更好。再比如，鼓励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消费政策。

投资不能只靠基建，我们要考虑如何推进有效投资。一些重大工程的投资工作，可以结合明年的“十四五”中期评估做出调整。房地产政策，已经明确了要减少需求侧管理的限制，更多地在供给端发力。供给端该救还是要救，风险该防还是要防，但是，需求端有些问题只有去买过房、跟房地产中介打过交道的人才能知道消费者的痛点在哪里。从这个角度，结合当前的房地产政策做一些调整，调整一些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的制度，这样消费者才会买账，市场才能真正稳定和恢复。

3、着重布局产业和科技创新政策

政策层面比较关注的一个词叫做重大生产力布局，过去在产业政策方面的确比较注重工程项目的布局。但如今要使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发挥成效，需要考虑向一些政策借力和转型。比如区域政策和人才政策，将来同样要作为和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同等重要的工具来看待。本次党的二十大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将教育、科技、人才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人才政策可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来看待，教育政策有时也同样可以作为一种跟经济政策紧密相关的政策。**这是因为要想真正把产业科技抓好，就要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地方人才的特点。**在这种前提下，某些地方的学科布局会对产业链的培育起到非常大的引导作用。

再比如数字经济，也和未来五年紧密相关。我建议至少在认识上要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看待。目前正在做的主要是打通“三融五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数据融合，以及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融合。这其中有很多

的市场机会。此外，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紧密相连，一方面要稳定已有平台的预期，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发展一些新的平台。

4、深化改革开放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改革的重大举措，结合改革开放四十五年，中央也会推出一系列新的举措。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真改革。今年部署的统一大市场就是一个最大的改革。这里面涉及到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都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可以作为明年推动改革神话的重要着力点。此外，目前很多省都在推要素的综合改革试点，这里可以有很多创新的内容。

经济工作会议把开放任务的重点落在外资上，这非常有针对性。去年我国外资基数比较高，今年数据也还行，也有一些标志性的项目，包括巴斯夫、空客等。当前环境下，有一些外资离开了，但这并不完全是因为营商环境，本质上还是由于中国市场在升级，门槛在变高。在门槛变高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改革来吸引外资进入。比如北京的两区建设就是在金融方面的一些突破。

党的二十大之后，一系列的首脑外交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最近，中央也出台了一些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外资文件。未来几年，我们将不断推动实现升级版的招商引资。

三、经济工作会的部署能否落实的关键点

1、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

今年中央国家机关开展了“学查改”活动，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了要继续完善落实机制，要以奋发有为的状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去做。在这个过程中，依然要按照去年的要求，防止两个谬误。防分解谬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防合成谬误。“六个统筹”中提到，要更好地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各项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项工作已经在做了，但是效果还需改进，机制还需完善。

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系统观念、底线思维，要把实践作为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这意味着在工作中，除了以前提到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之外，还要强调结果导向。**要真正要把“白猫黑猫论”贯彻好，把实践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

2、把政策的宣传解读放到和政策制定同等重要的位置

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做了重点阐述，即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中央还提出，要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近两年，各方面的预期转弱都跟舆论有关。一项重大政策出台后，由于舆论的放大渲染，甚至危言耸听，人们可能会对政策的解读产生偏差。一些自媒体将政策中个别的词刻意放大，干扰了预期，带偏了节奏。今后要高度重视这种情况，第一时间纠正和斗争，防止带节奏的言论把政策信号给解读偏了，解读歪了。特别是在一些重点领域和热点政策上，要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传递正确的信息。

总体来说，明年是值得期待的，今后五年也是值得期待的。共识已经初步形成，还需要各方面共同呼吁，让明年真正成为复苏的一年，重塑信心的一年，这样才能为未来五年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保持合理增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王一鸣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9期）上的发言

一、保持合理增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1、实现2035年经济发展目标要求保持合理增速

未来五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起步期，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战略性突破的关键期，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目标具有关键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现代化。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未来五年的主要任务。从经济发展目标看，最核心的是人均 GDP 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首先要迈过发达国家门槛。现在比较共识的是，发达国家人均 GDP 门槛值是2万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 GDP1.04万美元，不考虑价格和汇率因素，到2035年翻一番就能迈过这个门槛。人均 GDP 还涉及人口因素，现在一般预测2023年中国人口很可能达峰，之后一段时间会维持在14亿人口的平台。这意味着一段时间内，人口因素也可以忽略。这样，2021-2035年 GDP 年均增速达到4.73%，人均 GDP 就能翻一番。按照前高后低的趋势，“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应保持在5.5%左右，后十年降到4%左右。受疫情冲击影响，2020-2022年我国 GDP 年均增速4.5%左右，低于翻一番所需的4.73%年均增速，这个缺口需要通过未来经济增速的提升来弥补。

2、提高发展质量对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距离中等发达国家仍然有差距。中等发达国家是按发达国家的平均值还是中位数，有不同观点。如果取平均值，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大体在4.8万美元，剔除一些小规模经济体，也在3.5万-4万美元。显然，单纯依靠经济增速提升难以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考虑价格和汇率因素。从国际经验看，当后起追赶型国家由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经济

体、进入到一个稳定上升通道后，汇率水平都有大幅提升。因此，这个阶段，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改善经济基本面提升汇率水平，仍是实现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重要条件。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动态的。我们要达到的是2035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时候的发达国家门槛值可能还会有变化。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尽可能争取更快的经济增速，另一方面要更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只要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中国是能够实现到2035年的经济发展目标的。

3、较高的经济增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在讨论高质量发展时，一种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经济增速呈现趋势性下降，已经难以追求增长速度了，所以要转而追求发展质量。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速度和质量是此消彼长的。事实上，**没有合理的增速，高质量发展就很难实现。**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高速增长阶段，往往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快、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大的阶段。因此，较高的增速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本质上也是新一轮经济转型的开启。这个阶段，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各类风险往往“水落石出”。没有合理的增速，风险就可能集中暴露，提高发展质量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速过低也是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应对的挑战。

二、未来一个时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进入高质量阶段，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条件和边际产出发生改变，也就是生产函数发生变化。同时资源环境的约束持续强化，已经难以像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必须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来保持合理增速。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根据美国宾州大学数据库，过一段时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比值大体稳定在美国的40%左右。日本和韩国在高

速增长阶段结束时，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达到美国的80%和60%。近些年日本明显回落，降低至60%左右。如果2035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美国60%的水平，就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要明显高于美国。美国过去十多年年均增速大体在0.75%-1%，中国要达到2.5%-2.7%的增速，到2035年才能达到美国60%的水平。这样，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50%，难度是很大的。这需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来推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2、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达峰

2021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2.67亿，占总人口比重达18.9%。2025年，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不仅会影响供给端的劳动力供给，还会影响需求端的居民消费倾向，形成所谓“低欲望社会”，对消费形成制约。**我国人口峰值可能提前至2023年出现，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锚发生变化。**人口达峰意味着需求侧也会进入新常态，从需求端对潜在增长水平带来影响。

3、中美博弈和科技脱钩

中美博弈可能会伴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未来五年是关键期。近期，美国陆续出台了一些法规，比如《创新和竞争法案》，明确要保持美国在关键技术上领先两代的竞争优势；《芯片和科学法案》加大了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的限制。未来的趋势性变化很可能是科技脱钩，但脱钩是否会向其他领域延伸，这将是影响中国经济的不确定因素。

三、科技创新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尤为关键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什么是强？对大国而言，科技强才是强。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迅速提升。2022年全球创新综合指数排位中，中国已提升到第11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与此同时，与建设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科技创新仍存在短板和弱项，主要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领军人才偏少。走向未来，要在这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1、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由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我国重大原创成果还是偏少，引领前沿发展的源头技术供给不足。加强原始创新就要从源头做起，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引领原创性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2、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我国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缩小了我国产业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在部分终端产品领域形成了国际竞争力，比如，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高铁、工程机械、通信设备等，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中间品仍是短板，这就要从过去注重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转向中间品的原始创新。中间品市场竞争力不仅在于技术领先性，还取决于商业可行性，这就要增强创新过程的市场需求导向，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

3、培养科技领军人才

增强原创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在人才。我国科技队伍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领军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相对偏少。需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造就更多顶尖人才，带动基础研究突破，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同时，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二十大报告强调把教育、科技、人才统筹起来考虑，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要三位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

以产品创新带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苏剑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苏剑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9期）上的发言

一、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是产品创新

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都是产能过剩。对此，各国采取的办法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但通过这种方法扩大出来的都是劣质需求，且这种需求不可持续。若要一直扩大需求，就要不断扩张财政政策，使得政府债务规模越来越大。

一个产能过剩的经济要持续增长，需要依靠产品创新。也就是通过科技创新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新产品，通过新产品来扩大消费者的优质消费需求，从而使得总需求持续健康地扩大。比如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电脑、互联网、手机、电话、手表等，几乎都曾是新产品。这些新产品被开发出来后，由于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便利，逐渐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凝结在经济中，永远成为总需求的一部分。这种需求才是优质的需求，产品创新才是真正永久性扩大总需求的办法。

新产品刚出来时，如果它能够给消费者带来足够的边际效用，消费者就愿意花高价去买它。对企业来说，投资收益率就会比较高，企业对各种意外冲击的抗打击能力也会随之增强。这样的经济是比较健康的，对金融危机的抵抗力很强。从这个角度看，使一个经济能够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根本是产品创新，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不可持续。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曾经有大量的新产品，大量好的投资机会，所以企业都愿意投资，导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被拉得很高。当时美国联邦基金率低的时候在3%左右，高的时候在6%以上。而经济增长率也比较高，于是美国就出现了高利率、高增长的组合。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增长应该伴随着低利率，要想稳增长就必须降低利息率。但那个年代却是高增长和高利率的组合。2000年，美国经济衰退，开始降息刺激投资，这导致劣质需求出现，使得美国陷入次贷危机，最终把全球都拖入了一场金融危机。这说明，一国经济如果要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拉动增长，可能会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

二、长期零利率政策推动美国产品创新

2008年后，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美国零利率持续的十多年，欧洲的一些国家和日本都出现了负利率，这是非常出乎意料的。2000-2003年，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刺激出来的是住房投资，与之相关的是次级贷款。但在这十多年间，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刺激出来的是大量的新产品。

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技术，就是马斯克提出的太空旅游商业化和平民化。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航天员的身体素质要非常好，且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才能去太空。但这几年，美国的民营航天企业让身体素质普通的平民百姓都可以去太空旅游。同时，太空旅游的成本也降了下来，比如一张票25万美元，这就给商业化留下了非常大的空间。最近几年，美国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太空旅游可能是接下来人类消费的一个重要领域。马斯克还希望把人类送上火星，将人类变成多星球物种。此举可以媲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甚至要更加伟大，这会拓展出非常大的太空旅游空间。我们看到的星链系统、脑机接口、特斯拉汽车、元宇宙等等，在这十多年都逐渐面世，变成新的消费品，引领美国经济的发展。这是美国近几年经济好转的一个重要根源。

三、高利率+高增长造就高质量增长

目前，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已经提高到了4.25%-4.5%之间，这是非常高的，达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美国从零利率到了高利率，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正常的高质量增长的轨道。在我看来，**在高利率的情况下实现高增长，才是真正高质量的增长。**由于经济中有大量的优质投资机会，拉高了利率，于是就出现了高利率、高增长的组合。

在当前的高利率下，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都相当好，目前唯一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美国的通货膨胀是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去年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是美国此前十多年，尤其是最近这三年疫情防控期间，出台了大量的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前期需求极度扩张。需求在扩张，但能源危机导致成本上升，所以供给是紧缩的。需求扩张拉高经济增速，供给收缩压低经济增速，二者相互抵消，导致美国经济增速还可以。但需求扩张抬高价格，供给收缩也抬高价格，二者叠加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率非常高。

随着俄乌冲突逐渐结束，能源危机也将过去。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将会消退，美国通货膨胀率也会逐渐下降。需求扩张也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一方面是此前的货币扩张和财政扩张；另一方面，美国有大量的新产品，导致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比较旺盛，人们的消费需求也比较旺盛。

美国接下来可能会继续加息，但步伐会减缓。很多人预计明年美国的经济增速可能会降到1%以下，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了4.25-4.5%之间，若美国出现经济衰退，只需要稍微降低一点联邦基金利率就可以了。美国目前有足够的降息空间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衰退，不再是2008年以后零利率时期没有降息空间的情形了。因此，我认为明年甚至接下来的四五年，美国经济增速都不会太差。

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美国的形势不完全一样。它们的基本形势和美国差不多，但是在科技创新方面落后于美国。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在产品创新方面是领先的，欧洲、日本等国在这些方面是追随者。美国的加息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出现经济增速下滑甚至衰退的情况。但随着美国在新产品方面的技术进步，通过产品创新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慢慢会扩散到其他发达国家。因此，长期来看，它们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十多年的零利率政策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非常好的科技进步成果，这些成果将继续推动美国经济向前发展。**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把脉中国经济　传递中国声音
Taking Economic Pulse, Forcasting Economic Future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1105
Add: 1105, Lide 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网站：http://ier.ruc.edu.cn/

微信公众号：